

吴小如 / 著



舊時月色

吴小如早年书评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舊時月色



吴小如早年书评集

吴小如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时月色: 吴小如早年书评集/吴小如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301-21218-9

I. ①旧… II. ①吴…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3286 号

书 名: 旧时月色——吴小如早年书评集

著作责任者: 吴小如 著

责任编辑: 沈莹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218-9/I·2515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93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dianjiwenhua@126.com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4.5 印张 280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出版说明

我们把吴小如先生六十多年来结集的文章（包括三分之一近十多年的新作或尚未收过集子的文章），按类别遴选，编为《莎斋闲览——吴小如八十后随笔》、《旧时月色——吴小如早年书评集》、《看戏一得——吴小如戏曲随笔》、《含英咀华——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红楼梦影——吴小如师友回忆录》五本。其中，《莎斋闲览》已先期出版，下面谈谈另外四本书的选编情况。

吴先生自幼养成了爱杂览的习惯。《旧时月色——吴小如早年书评集》，都是吴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少作，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博极群书的影子。一九四七年写的《读朱光潜〈谈修养〉》，先生就指出当时教育的缺陷：“主要失败原因，乃在于把作人与读书分成截然两途。学校只是知识贩卖场所，操行一端，学校当局视若无睹……有些青年，在学校时热情腾沸，意气昂扬；及入社会，不是因寒心而堕落，便是同流合污，随俗浮沉。其所以有些现象，大都在于个人品德方面的修养远远不足。”中肯的评语，有助于我们阅读理解这些作品。

吴先生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接触京戏，一九三二年全家迁居北京，开始看京剧名家的演出。四十年代初，正式寻师访友学唱整出的老生戏，并不断写剧评，开始了戏曲的学术研究。听戏、看戏、评戏，为先生研究戏曲积累了许多的素材和经历。这次，我们选录了《鸟瞰富连成》及续、再续篇，以及吴先生近年来未结集的戏曲方面的

文章，编为《看戏一得——吴小如戏曲随笔》。“看戏一得”乃先生自谦之词，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文章“篇幅虽短，却非捧场文字，褒贬取舍，愿略存‘良史’遗风。知我罪我，惟俟来哲”。

《含英咀华——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选编了吴先生有关古典诗词散文的文章，吴先生说：“每立一说，每下一断语，都是经过再三考虑，审慎落笔。因此也就不愿对自己的一得之愚随波逐流，轻易否定。”另外，书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先生未曾结集的文章，尤其对文化学术圈中普遍存在的语文知识的缺点和错误忧心忡忡，由此而大声疾呼，锲而不舍地纠错指谬。

《红楼梦影——吴小如师友回忆录》所录，有回忆先生父亲吴玉如先生的，从中可以看到玉如老先生书法艺术的几个阶段和特点，也了解到小如先生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家庭教育。在回忆林宰平（志钧）先生的《“一代孤高百世师”》一文中，吴先生拳拳于林宰老慧眼提拔沈从文，“以推毂后进为己任，更以忠恕待人，以无言之教启迪青年”。《绛帐依依四十年》一文里，他总结俞平老的治学特色是：“承曲园公（按，俞樾，号曲园）家学，主要是通过考据训诂，以求得对辞章的正确理解和深入欣赏。这样的治学途径，正是我所仰止并始终遵循的。”更为可贵的是，“俞老一生，平易冲和，仁蔼可亲；但出处之间，从不作无原则的迁就。对世俗之毁誉，往往一笑置之。”小如先生之所以受到师辈的器重，和他能深得前辈学者的学术精髓，又能恪守君子之道显后凋之姿是密不可分的。

这些文章，典雅端庄，炉火纯青，为文渐有潦水尽而寒潭清之意，读者当能体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九月

| 目录 |

出版说明/1

一、《读书拊掌录》选

读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001

读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019

读俞平伯先生《读词偶得》（重印本）/022

读俞平伯先生《清真词释》/026

读郭沫若先生《十批判书》/030

论孔子的立场/039

读傅庚生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044

读青木正儿《元人杂剧序说》/052

读周予同著《朱熹》/055

读陈登原著《金圣叹传》/062

读萧望卿著《陶渊明批评》/067

读萧士玮《春浮园全集》/074

读蒋春霖《水云楼烬馀稿》/085

二、《书廊信步》选

废名的文章/089

读萧乾先生《南德的暮秋》/099

读萧乾先生《梦之谷》/103

读刘西渭先生《咀华集》和《咀华二集》/111

读常风先生《弃馀集》/118

三、《今昔文存》选

读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127

读钱锺书《人·兽·鬼》/131

读冰心《关于女人》/138

读巴金《还魂草》/141

读老舍《面子问题》/144

读沈从文《湘西》/146

读沈从文《春灯集》/153

读朱光潜《谈修养》/158

从《蜕变》经《腐蚀》到《清明前后》/161

读茅盾《耶稣之死》/165

读冯至《伍子胥》/167

读冯至《山水》/171

读李广田《诗的艺术》/177

读顾随《乡村传奇》/181

读江绍原《发须爪》/185

读萧乾《人生采访》/188

读鹤见祐辅《拜伦传》/196

读张爱玲《传奇》/205

读师陀《结婚》/209

读罗家伦《西北行吟》/215

四、《心影萍踪》选

读张爱玲《流言》/219

读老舍《猫城记》/223

读百灵《未明集》/226

从《汉园集》到《十年诗草》/231

——纪念几位诗人

读毕树棠译《贼及其他》/235

读《穆旦诗集》/239

读《笑林广记》/243

《文学杂志》的去来今/249

关于《子恺画存》/253

五、其他

关于投稿/258

读《东海巴山集》/261

——兼论当代小说作家

三个短篇集/266

读丰子恺先生《贪污的猫》/272

读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275

读《预言》/278

读小田岳夫著《鲁迅传》/282

——纪念鲁迅十一周年作

说汉诗/291

《西洲曲》臆解/298

读《皮子文薮》/305

读李卓吾《寒灯小话》/311
读王昙《烟霞万古楼诗集》/316
山雨欲来风满楼/322
——读许丁卯诗
顾石公先生诗文录/328
读石永懋编著《论语正》/335
古书今读说/344
关于伤乱诗/349
——啖暖录并序（一）
论陷贼文人/354
——啖暖录（二）
关于汉奸文人/357
——啖暖录（三）
漫谈安内攘外/360
——啖暖录（四）
啖暖录（五）/363
啖暖录（六）/366
严忠济《天净沙》/369
郑介夫及其诗/371
板本的话/375
人文的悲哀/379
吊郁达夫先生/382
莎斋余话/385

读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

笔者按 这是我三十六年前为悼念朱佩弦先生逝世而写的一篇习作。根据篇末所记，我从先生逝世的次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开始动笔，到十月四日才脱稿，前后共写了五十天。读者不难从文字中看出，我是带着悲愤抑塞的心情来写这篇读书札记的。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不愿写一般的浮泛悼念文字，所以采取了这个方式，来纪念我由衷敬爱的师长。几十年一眨眼过去了，回顾一下当年所写的文章，发现自己今天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并无显著进步，深感有愧于当年的师辈对我的期望和教诲。近年来，出版界陆续重印了陈寅恪、朱光潜、朱自清和俞平伯等先生的旧著，我以为这是大好事。因此我想，今天的读者除了从老一辈学者当年的学术成果中汲取营养之外，是否同时也披览一点彼时的读者在刚刚读完这些新著时写的学习心得，作为参考呢？于是搜检旧稿，仅于字句间略事增删，并把所引《诗言志辨》的原文据新版一一加以校订，拿来发表。这既作为对朱先生的纪念，也算是对自己的鞭策。文中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能用今天的新尺度给予批评，则受益尤多。谨此先致谢意。

一九八四年七月笔者记于北京。

朱先生是治文学史的，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一种自出机杼却又与古人不谋而合的“史观”。这本书恰恰代表朱先生向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开端。天假以年，他可能在若干年后，沿这条路线写下整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史，一如先生的话，“造成了新传统”。而现在，我们只能就这本书来作尝鼎一脔的述说。可悲的是，这“一脔”已等于先生工作的全部。这唯一的果实也就是最后一颗果实了。

我承认我一个朋友极沉痛的说法：闻一多先生死得“烈”，而朱先生则死得“惨”。所谓“惨”，不仅指先生的夙志未偿、素心难展以及贫病交迫、妻孥无托、身后萧条等等而已；实是形容尽了我们这些如失怙恃般的青年们内心的苦痛。而我们荒凉芜杂的文坛更因此愈显得空虚寂寥，“惨”不忍睹。尽管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已足汗牛充栋，甚至连一些可怜又复可笑的人都在牵强附会地同死者拉拢，开会演讲，借以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可是这一代宗匠终于弃我们撒手而去了。悲哀悼惜，一切徒然。固然先生的精神与人格将永久彪炳人间，而他遗留下的那一份工作却更需要后死者低首下心地来作检讨。现在笔者愿站在一个青年学生、一个普通读书人的立场，忘记自己的空疏谫陋，为这本《诗言志辨》作不大客观的评价。

书前有一篇作者的自序。从序文中我们已能鸟瞰全书。首先作者谈到我国自五四以来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进展，跟着又谈到建设文学批评的重要性，然后接着说到“诗文评”（即我国古代有关文学批评的散见的材料）的原料及渊源：

……专书以外，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即使不更多，诗文

评的材料，直接的或间接的。前者如“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后者如《庄子》里“神”的意念和《孟子》里“气”的意念。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批评史。至于选集、别集的序跋和评语，别集里的序跋、书牘、传志，甚至评点书，还有《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诸注里，以及小说、笔记里，也都五光十色，层出不穷。这种种是取不尽、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页一八九）

从这里我们看出作者的用心。他确乎想追本溯源，做一番“流贯”整个文学批评史的功夫。作者是非常吃苦耐劳，认真做着“爬梳剔抉”的功夫的。同时，作者更表曝了自己的态度：“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用一番踏实的劲儿。然而从这儿也流露了作者的寂寞：“人手越多越有意思。”为先生所爱与夫爱朱先生的青年们啊，我们是否能够帮助（现在应该说“继承”了！）他出一臂之力呢？

跟着作者谈到关于《诗言志辨》本身的话：

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及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令或行政法令。两者的作用都在政教。从论“辞”到论“文”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这里姑且不谈；只谈诗论。“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接着是汉代提出的“诗教”。汉代将六艺的教化相提并论，称为“六学”；而流行最广的是“诗教”。这时候早已不歌唱诗，只诵读诗。“诗教”是就读诗而

论，作用显然也在政教。这时候“诗言志”、“诗教”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但诗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说过“论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确也说过知人论世。毛公释“兴诗”，似乎根据前者，后来称为“比兴”；郑玄作《诗谱》，论“正变”，显然根据后者。这些是方法论，是那两个纲领的细目，归结自然都在政教。

这四条诗论，四个批评的意念，二千年来都曾经过多多少少的演变。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意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诗教”原是“温柔敦厚”，宋人又以“无邪”为“诗教”；这却不相反而相成。“比兴”的解释向来纷无定论；可以注意的是这个意念渐渐由方法而变成了纲领。“正变”原只论“风雅正变”，后来却与“文变”说联合起来，论到诗文体的正变；这其实是我们固有的“文学史”的意念。

这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但《比兴》一篇却只能从《毛诗》下手，没有追溯到最早的源头；文中解释“赋”、“比”、“兴”的本义，也只以关切《毛诗》的为主。……（《论文集》页一八九至一九一）

全书的筋骨脉络，从这三段文字中已见出梗概。作者的主旨尤其明显，是“研究那四条诗论的史的发展的”。我们切不可误认作这本书只是谈到有关《诗三百篇》的几个问题的源头而已，作者还谈到它们的流变，从先秦直到如今，而这后面的部分对我们似更为重要。

因之“这本小书”简直可以作为在某种“文学史观”下的文学批评史——或竟说是文学史——来读。至其所以能写得这么周详，谨严，谦抑，平易近人，则应归功于作者既是一位治文学史的学者，又是国内有数的诗人、散文家。

二

书的第一部分，即是从“献诗”、“赋诗”种种历史上的证据，讨论到“诗言志”之与“政教”、“修身立德”、“穷通”有关，说明“志”即是“道”。跟着说明诗、乐最早是不分家而后来则分了家的历史。由于诗、乐的分开而产生了以“义”说“诗”，然后“教诗明志”而有了“诗教”，而有了孟子的“知人论世”。于是很容易却顶正确地推翻了《诗序》的矛盾：“将‘以诗合意’的结果就当作‘知人论世’，以为作诗的‘人’、‘世’果然如此，作诗的‘志’果然如此；将理想当作事实，将主观当作客观”。结论是：“自然教人难信”（页二一三）。虽说推理水到渠成，却是作者深切著明地思考的结果，不由我们不心悦诚服。

由诗、乐分家然后谈到“陈诗”、“采诗”诸学说的渊源。最后还是归结到“言志”即“载道”。另一方面，作者把“言志”和“缘情”却摆在对立的地位。作者的看法是：有关政教的诗，当然所“言”之“志”即是政教；无关政教的诗如男女私情之作，乃是由于“采民风”、“观民俗”所保留下来的（页二一六）。作者更认为：“《诗经》里一半是‘缘情’之作，乐工保存它们却只为了它们的声调，为了它们可以供歌唱。那时代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的。”（页二〇二）于是《诗经》里所有“缘情”的诗，不关政教的诗，其流传下来的机会都算作例外；而有关政教的诗都被合法地保留，以紧缩了“志”的范围。“志”的范围只是合于“道”（与政教有关）

的，于是“言志”乃与“载道”之义相差不多，而与“缘情”则不能混为一谈了。作者的结论是：

总之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只着重听歌的人；只有诗，无诗人，也无“诗缘情”的意念。诗乐分家以后，教诗明志，诗以读为主，以义为用；论诗的才渐渐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他们虽还不承认“诗缘情”本身的价值，却已发现了诗的这种作用，并且以为“王者”可由这种“缘情”的诗“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那么“缘情”作诗竟与“陈志”献诗殊途同归了。但《诗大序》既说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情性”；后二语虽可以算是“言志”的同义语，意味究竟不同。《大序》的作者似乎看出“言志”一语总关政教，不适用于原是“缘情”的诗，所以转换一个说法来解释。到了《韩诗》及《汉书》时代，看得这情形更明白，便只说“歌食”、“歌事”，只说“哀乐之心”，“各言其伤”，索性不提“言志”了。可见“言志”跟“缘情”到底两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页二一六至二一七）

笔者对于“言志”有关政教的说法，非常同意；而对作者把“缘情”和“言志”完全看成两回事，颇觉有所欲言。我想“志”这个词的涵义总有“情”的成分在内，“言志”也未必就同“缘情”完全对立。况且“言志”固然同“载道”差不多，却毕竟不是载道。我的看法是：“言志”一词的涵义，是统摄“载道”和“缘情”的。“言志”所以在先秦时偏于指政教，到两汉以后乃接近于“缘情”，稍后更别出“明道”或“载道”一名以代替“言志”的说法，这同各个时代受教育者的背景环境有关。而这一点却为作者所忽略。另一面，诗人也并非没有缘情的自觉，因而“言志”正不必同“缘情”

一定要分家，或竟把两者相对立起来。这道理极浅显，下面就来解释——

我们知道，在孔子以前的教育是“不下庶人”的，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子弟、公子王孙，纵有所谓“士”，也还是候补的官僚政客，早晚能够当上“大夫”的。然则他们受教育的目的不问可知，除了政治、教化、外交、朝聘、燕享种种与家国宗社发生关系的事情以外，别无其它。即使在修身表德方面下功夫，在“礼”、“乐”中陶冶情性，其最终目的仍脱不开“政”、“教”。作者在本书中所依据的《左传》、《国语》、《尚书》以及其它子书中的例子，只能说明一件事，即这些“献诗”、“赋诗”乃至“作诗”的人都是贵族，都是公卿大夫；而他们的“志”固然无非政教；即他们的“情”也还是离不开政教，或至少与政教有关。但不能因此就下断语，说“志”指的只是政教，没有别的。因为凡人皆有志，“政”、“教”只是受教育的人所表现的“志”，不是所有的“诗”的作者的“志”。尽管说，那一半“缘情”之作诗所以收入《诗经》是因为能唱——“诗乐不分家”；尽管作者承认朱东润先生的说法，说“国风不出于民间”；尽管说陈诗观风，一些民歌之被采辑乃是为了观民情正人心之得失；但我们仍不能说那些诗不是“缘情”之作。乐工虽然没有“缘情”的自觉，同时“只有诗而无诗人”，可是作“缘情”诗的人在作诗时必然是“志于情”的，而非“志于政教”的。因为我们不能说那一半缘情诗根本没有作者，更不能说那些诗的作者也都是以“政”、“教”为“志”的人。再退一步说，即使那些诗人心中也有着不离“政”、“教”的“志”，可是方其作诗时思及男女悦慕之情或其它情感时，这种情感也不能不算作他们的“志”，而这种“志”却显然与志在政教的“志”无关。然则“政”、“教”只是“志”的一部分，只是某一部分人的“志”，甚且这某一部分人虽志在政教，但有时也

会产生不完全志在政教的“志”。不过一方面是“志于道”，一方面是“志于情”罢了。

作者曾引到《论语》中“盍各言尔志”的话，以为其“言志”即指“政”、“教”的证明。殊不知孔子开创学派以后，受教育的虽不尽是贵族公卿子弟，而孔门中却十有九是“志于道”的人。他们虽非官宦出身，可心里确是想做官的，所以把“志”的范围推广而为“表德”，并把自己的抱负——也就是“志”——寄托在一旦做了官之后将如何推行自己的“道”的上面，因而产生了诉说命运的“穷通”。等到秦以后，贵族与庶人的距离日益缩短，界限也日益淡漠，这种观念于是也逐渐改变，除掉贾谊、晁错、董仲舒及一些经生们仍以“政”、“教”为“志”，而《诗大序》及《韩诗》中的议论，已属于比较“大众化”一点的声音，带有一班不一定爬得上公卿大夫的地位的“士庶”口吻了。夫教育之特权既不为贵族所专有（虽然要成为贵族公卿，还得从受教育做起），所以尽管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无形的道统以后，“缘情”的乐府诗却不断产生，数量也逐渐多了起来。可见“诗”之性质全在作者受教育的背景与受教育的目的。不信的话，试看《古诗十九首》，其中既有“缘情”的诗，又有“载道”（或说“言志”）的诗，而乐府诗则十有九为“缘情”的。而东汉以下至建安、黄初迄于西晋，那些为士大夫所拟作的乐府诗，却又十有九不免“志”在“政教”或“穷通”了。这纯粹是环境背景和作诗者本人的身分使然，而非“言志”本身与“缘情”有什么两样或彼此对立。至于作看说，汉以后的人竟不谈“言志”，到陆机乃明言“缘情”，迄六朝时又有“明道”的说法，我想，这也并非“言志”本身变了质，只是后来人看得更清楚，觉得“言志”一辞已包括不了更多的内容，才分化出许多新辞来罢了。犹之今日文坛上各种口号和术语，十之七八非古人所有，间有